

華人社會的特質與教育

陳耀南

前言

對一名中文系教師來說，應邀到社會工作社會行政學系的研討會報告一點意見，既是榮幸，也是異數——令人覺得是意外的事，並不困難；令人同意是分內的事，並不容易。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解釋：由於傳統習慣以至學科本質的原因，中文系要處理的，很難只限於中國語文、或者中國文學，而不及於中國的社會與文教；即如往日中國士大夫通通自負地以「國事天下事」為「終極關懷」，而不屑於只知數黑論黃，吟風弄月。我們說他好為大言也好，頭巾氣也好，畢竟這是事實。

當然，時至今日，從前令人敬重的，經世濟民的中國式士大夫，今天許多已經被界定為社會學和社會工作者。西方重分析，重專精的學術風氣，固然早已遍及世界，而為補救分科過細而興起的科際整合，又已經蔚為時尚，一位中文教師，在習慣了的「文史哲不分家」口號壯膽之下，被胸襟開闊的社會工作與行政學者，帶領過來，參觀一下名正言順地關心社會、造福人群的學術門庭，窺探一下裡面的：「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」，相信也不會因為沒有護照，

也未有簽證，而不准入境，或者驅逐出境吧。

提起護照、簽證，這些給現代華人帶來許多麻煩或者不同的特殊感覺的東西，對「家庭」和「天下」觀念濃厚而「個人」、「國家觀念」較為薄弱的傳統華人社會來說，確是夢想不到的新生事物。在晚清以前，在「海內一統」的時候，固然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；即使神州分裂的非常時期，不論「楚材晉用」，或者「朝秦暮楚」，都不必「簽證」，也沒有所謂「護照」。傳統的華人社會和今日華人社會，形態和環境，真是大大不同了。變遷的事物，又何止簽證與護照呢！

我們現在所謂「華人社會」，當然廣及於海外各國都市的「華埠」(China Town)，而台灣，香港，以至華人占了大多數的新加坡，早已發展了舊日中國所無的海島型工商經濟。即使在中國大陸，自從改革開放以來，沿海一些大小都市，急劇改變，也是顯見的事實。不過，全球華人的七八成以上，還是中國大陸的農民，幾千年傳統根基的華人文化，還是以大陸農耕型為本。

社會的型態與教育是交互影響的，社會種種的特徵，表現了有關的人群的

文化與價值理念；而文化的創造與價值觀念的傳承，又與教育的取向與方式互為因果。所以，華人社會的種種特徵與教育狀況，就表現了中國文化。

華人社會，最初建立於黃淮平原，發展到江漢流域，廣及於整個東亞大陸。大陸的東與東南，是古人難以逾越的大洋，西、北兩面，是窮荒的大漠，西南，是艱險的橫斷山脈與世界屋脊，幾千年來，華人社會就在這個大半封閉而又相當廣大自足的空間之中發展。溫帶的沖積平原與丘陵，是以農耕為生產之地。農業是附著於大地的培養生產，老百姓不免望天打卦，祈禱豐年，但更要合力耕耘，勉盡人事。人與人的協和、人與天的適應，當然就是生存與發展的首要條件。只有「家和」，才可以「萬事興」，只有「風調雨順」，才有希望「國泰民安」（註1）農家樹藝五穀，畜養雞豚，必須忍耐栽培、珍惜生命。生命孕育於深藏果實之內的種子，於是探索人生的價值根源，也自然地向內尋求，反省本心。生命是天地所惠，田土是先人所遺，而寒暑循環，四時有序，春華秋實，代代如斯，於是敬天法祖，尊古守常。大地是博厚的，上天是高明的，時間是悠久的，「健行不息」，「厚德載物」（註2）就是幾千年來華人社會的文化教育精神的核心所在。以「人」為本、以心「為始、以「情」為通、以「和」為貴，以「族」為親，以「古」為尚，以「君」為尊，以「德」為教……這種種華人社會文化的特質，以及作為代表的儒家倫理教育，都是這樣悠久而自然地形式的。

了解社會，是社會工作的先決條件；而社工教育，又是教育的一環。以下，我們嘗試探討華人社會的若干特徵、這些特徵與教育的關係、以及在現代的展望：

一、本人文

以人為本、以人文為教，這是華人社會的精神骨幹。

所謂「人本」，就是不以神、不以物、而以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，作為價值觀念的根本；所謂「人文」就是人的文化成就，表現生命的價值。

華人社會向來並不缺乏神的信仰，不過神的世界其實就是人類社會的一個高級縮影，與人的世界往來溝通，天上的神靈與人間的聖賢互相轉化，被敬重的是神的崇高道德和造福人類的力量。所以，神實在是為人而存在，並非獨

一，也並不超越。

另一方面，在華人的傳統文化中，「人」被視為「天地之心」，與天地相參而共稱為「三才」，比起講人為帶有原罪的受造之物，或者講人為進化中的動物之一種的各種其他社會文化，是頗異其趣的。

傳統華人社會之中，人的價值主要表现在倫理道德之中；至於獨立於道德以外的其他文化價值怎樣建立？獨立於政權與家族以外的個人人格與人權怎樣肯定？這便是飽受西方文化挑戰與薰陶的現代華人社會嶄新的教育課題了。（註3）

二、務實際

樸實的農民因為要辛勤地耕種為生，自然重視實用，「腳踏實地」，依循節律有序的氣候而過活，純理的思維和浪漫的想像因此也不受鼓勵。（註4）《周易繫辭》所謂「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，是與神物以前民用」，所謂「制而用之謂之法，利用出入，民咸用之謂之神」，這是華人社會文化教育傳統，以「民生日用」為當務之急的理論依據。造福世界的四大發明，就是古代華人的聰明才智配合了務實精神的結果。

不過，「知其然、用其然」的華人社會科技發明，到了西人社會，卻被吸納，被昇華而為「知其所以然」的科學原理的探討，探討有得，便轉過來再發展進一步的科技，並且以後出轉精的科技成就，衝擊華人社會。這是因為西方有重視知識原理、邏輯規律，並且進而戡天役物的古希臘傳統以及「替上帝管理世界」的希伯來信念之故。（註5）

百多年的西潮衝擊之後，傳統的務實尚用精神，又發揮於現代華人社會的重視科技與財經實務的教育風氣。二十多年來創造經濟奇蹟的東亞四小龍，接近三個是華人社會；此刻躍躍欲起的泰國，馬來西亞，他們的社會結構也以華裔為重要成分。近年中國大陸在鄧小平著名的「白貓論」務實政策之下開放改革，只要不被打斷，不再走冤枉路，由東南沿海而漸及內地的繁榮進步，也是明顯可期。這都是勤奮與務實兩個傳統結合的成果。

當然，「實」的應用是以「虛」的理論為根源，而只善玄虛於道德心性。不善玄虛於知識理論。更是傳統中國文化的一缺漏。要真的全面發展現代文

化，華人社會新的教育方針，還是要虛實兼顧。

三、崇道德

爲了大眾的實際福利，一切社會工作與行政，必須有裨於國計民生，一個人的言行，也最好有益於人心世道——雖然，古人曾經宣稱：「正其義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」，其實，世間的公義，人生的正道，也就是群衆最好的福利，社會最大的功德。當然，到了最高境界，是「但須行好事，莫要問前程」，一切爲了「心安理得」，但求「心之所安」，這是人與其他動物最不同的價值自覺。換句話說：道德，使人超出萬物，使人高貴。這是幾千年來，華人社會的共同信仰。

中國文化在上古的成型時期，便已特別尊崇道德。儒家所標舉的仁、義、便是人類生而有之而又異於禽獸的同情之念與是非之心。從此而出發的道德理念，其精神便在於所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的「忠恕之道」（註6）。所以，倫理教育的重點，便不在古希臘式的，知識性的抽象定義的探求，而在於「務實」地躬行踐履。（註7）

從古到今，華人社會都彼此督促勉勵：不可言行乖違，要真誠地實踐理想。最明顯表現這個社會期許的，莫如許多華人父母爲兒女所取的名字，就是以道德作爲終生的勗勉。到了現代，在華人社會之中，還是以「儒將」，「義勇軍」稱譽武人，以「仁心仁術」讚美醫師，鄙薄「爲富不仁」，「有文無行」；連本來低賤的行業，一旦被認爲是「俠盜」、「義丐」，便已可算「仁人居子」而備受尊重。所以，以華人社會所公認的教育理想而言，道德價值冠於一切，是個長久以來的事實，也是儒家文化對世界最大的貢獻。

不過，爲了尊崇道德而輕視了其他文化環節，以至對他人苛責苛求，也有不良影響。傳統的華人社會，經常強調道德規範的建立維持，對個人的獨特才性、對知識、藝術等等的獨立地位與規律、對經濟活動的研究與促進，都不免疏忽，這都是造成近代華人社會貧窮落後的部分原因。至於人們爲了本身特權與利益而對道德教條曲解，利用，造成所謂「禮教吃人」，更是「泛道德主義」的不良影響。

當然，顯而易見的是：在劇烈的西潮衝擊之下，上述情況，經已大有改

變。現在的問題變成：步武西方的科學、民主、法治、人權，不免是「從善如登」；習染西方的放縱物慾，膨脹個人，往往是「從惡如崩」！在倫理道德方面，怎樣認識中西文化的互有短長，擇善而從，也是今日華人社會教育方面另一種當務之急。

四、重人情親家族

農業社會，附著於賴以生產的土地，維繫於世代聚居的宗族，閭里相望，雞犬相聞，於是青山綠水，恍若舊朋，阡陌相逢，無非素識，久而久之，形成一個所謂「天地有情，人間有緣」的世界。

情的世界，自然從身邊的親人開始。所謂「親親而仁民、仁民而愛物」，也是自然而應有的擴大。儒家的教育，就是本著這個精神與順序，來編織人倫的大網。在「情」的網絡中，每個人都有所定位，都有相關的守則——即所謂父慈子孝、兄弟恭之類，因而獲得安全的保證與榮譽的標準。其中最基本而又最堅固就是「家族」一個層次。所謂「天下之本在國，國之本在家」，傳統的「五倫」之中，親族關係就佔了三個，「朋友」、「君臣」兩倫，也是依照家庭架構而展衍。所以，許多社會學者都同意：華人世界，不是「個人本位」，也不是「社團本位」，而是「家族本位」，華人的生活方式，是以人際關係中的「情境」爲中心，而以親人之愛爲出發點。所謂「孝弟也者，其爲人之本歟」。所謂「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」，這些傳統的聖賢之教，在華人社會之中，迄今仍是根深蒂固。（註8）

華人親族名目之多、關係之密，在世界各大族群中恐怕無出其右。舊日有「君父」、「臣子」、「子民」的講法，今天仍然使用「師父」、「徒弟」的稱謂；千百年來的朋友，師生之間，都稱「兄」道「弟」——所謂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」，不只異姓而同鄉、異縣而同省、異省而同國，甚至不同國籍，只要有感情上的契通，都可以若干程度地表現「天下一家」的理想。至於幾十年來我們聽慣的一聲「同胞」，就片刻凝聚了七洋五洲的華人社會；一聲「炎黃子孫」，就暫時淡化了意識形態的差距！

華人社會愛親族、重人情的特徵與無形教育，在繁衍民族，傳承文化，加強個人責任感，代替政府法制與福利工作功能等等方面，無疑都有正面的貢

獻。在今日以美國為顯著例子的西方社會，個人主義過度膨脹，造成嚴重的人際關係危機。科技物質成就超卓，而人們的爭執、仇視與猜忌，有增無已，甚至親情的堡壘——家庭，亦紛紛崩裂、瓦解。華人社會重人情、愛家族、互以對方為重的傳統，可能正是補救的良藥。（註9）不過，「情」的本質到底與「理」，「法」有別；在沒有對等地強固的理智與法制傳統與它均衡的時候，過重人情，過重家庭的流弊，也正不在少。

第一

家族觀念擴展到國家政治上面，「君父」與「臣子」、「子民」的差距更大，矛盾更甚。前者因濫權而更易腐敗，後者的獨立人格與自主精神更被壓縮。這個情況從秦漢一統就開始劇烈，經過二千多年的演變而惡劣到極點，卒之因為時代潮流的沖擊，爆發了民主革命而崩碎，不過，在華人社會中，「家長制」、「一言堂」的遺毒，仍然有待繼續清除。

第二

「親親」與「尊賢」都是儒家的主張，而又免不了本質的矛盾。家族之情重，則法制之念輕。因私害公，裙帶政治，是華人社會歷來的關係通病（註10）——雖則這個毛病，也開始被時代潮流所沖刷而有漸漸減輕的跡象。

第三

華人社會的傳統看法，以國家倫理甚至國際倫理為親族倫理的擴大。深入人心的《禮記·大學》所論：「齊家治國平天下」便是典型的理論代表。揆諸實際，往往並非如此——佳兒賢父，不一定生在同一家庭；家庭問題之難以解決，也不礙政治家之為政治家。這是淺顯而又常見的事實。所以現代社會領袖，有「第六倫」（群——己）的說法（註11）。總之，傳統的「家族倫理情感教育」之外，必須均衡以「社會倫理法制教育」，這也是今日華人社會另一項應有的發展。

五、尊往古尚保守

傳統的華人社會，依存於四季循環年年如是的農耕生產，加上與此配合的宗法社會禮敬祖先的教育。於是形成尊經驗、尚保守的文化。另一方面，中國東瀕大海，在近代之前，沒大遠洋交通的可能性和必需性；而北、西、西南三

面，又歷來都是文化遠低於中國的外族，所以，當代的華人社會有甚麼重大疑難，只能向前代的華人社會的經驗與智慧找尋解答，並且以前人的成功例子來增加說服力量。先秦諸子已經有「託古改制」的風氣，唯一不崇古、不法先王的法家，又因為暴秦的速亡而被視為反面教材，從此，尊古人為權威，以復古為更新，就成了華人社會的特徵與教育風氣，而好作假古董，怯惰於自我創新，便是由此而致的後遺症。近代以來，因為屢經無情的衝擊，這種傳統已經大大改變了。

六、貴和合重均平

華人社會長期發展於農村，深知風調雨順、天人配合，才可以五穀豐登；酷暑嚴寒、逆天行事，都非生活之福。至於家族鄰里，世代共居，更唯有妥協和平，才可以共存共榮。於是，惡極端，喜調和，務折衷、尚平均，就成了華人社會的文化特色。所以，患病謂之「違和」，交惡謂之「失和」，「政通人和」、「協和萬邦」，是太平盛世，「百年好合」，「琴瑟調和」，是婚姻幸福，「和合二仙」是民間喜愛的神祇——總之，「家和萬事興」，一切都「以和為貴」。

貴和合，重人情，於是「必也使無訟乎」就成了聖人之言，「生不入官門；死不入地獄」就成了百姓之訓。華人社會的教育傳統，重視以「節人」之禮，「發和」之樂，來陶冶性情，而避免多作法理的爭辯，更力戒發動戰爭；戰爭英雄在華人社會中向來是得不到西方式的狂熱崇拜的。儒家的仁愛、道家的恬淡、佛家的慈悲，協同鑄造了一種在今日世界尤其珍貴的和平文化。這種傳統，當然值得在華人社會中好好保存——雖則百多年飽受霸道文化侵凌欺侮之餘，一種適度的尚武精神，也同時在華人社會之中復活。

七、安天命寬宗教

古代華人社會，也不是沒有鼓勵鬥爭、戡天役物的思想，不過長期居於主導地位的，還是主張包容調協、盡其在我的儒學正統，以及逍遙恬淡、順適隱退的道家、和慈悲忍讓、望報他生的佛家。「守分安命、順時聽天」，「命裡有時終須有，命裡無時莫強求」，就成了這個農業社群的傳家寶訓，也可能是許多發展都墮乎西方之後的一個原因。

佛道兩教，都勸人戡破生死的迷執，儒家更對靈魂死後的事避而不談，而教人努力於現世立德立功立言，以此來安身立命，追求另一種境界的不朽。另一方面，華人社會重實用，尚寬容的精神，又使「只要都是導人爲善，一切宗教可以相通」的信念，流傳得長久廣遠。因此，超越而烈性的「獨一真神」，對華人社會來說，是陌生的；宗教戰爭，是不可想像的。對嚴肅到近乎極端的宗教門徒來說，華人傳統的信仰態度，可能是涉於功利，不夠莊正，進不了天堂；不過，對於已經苦於鬥爭太多太久的人間世界來說，「道並行而不相悖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」的胸襟與理想，毋寧是值得發揚的。

八、經濟觀念

當代最大的華人社會，自從「改革開放」以來，現在已經弄得「全民皆商」，連軍隊也踴躍地「向錢看齊」，大做生意；至於經濟繁榮名震世界的「東方四小龍」，華人社會幾乎佔了四分之三。華人被許多人目爲「天生的商人」甚至「經濟動物」——有趣的是：尊士、重農、輕工、賤商，商人被貶稱爲「市儈」，位居「四民」之末，卻是華人的傳統觀念，到近代才大大更改。

自從以農立國的周朝取代了殷商，「商人」就成了「逐利於市者」的稱號。儒家教人「重義輕利」，「樂道安貧」，法家憎恨商人中間剝削，財雄勢大而危及政府。陽儒陰法既是漢代以來歷朝統治的共通精神，「重農抑商」也就是歷代的共同政策。另一方面，如前所述，「守分安命」以至「順時認命」既已早是儒道佛諸家匯成的全民性格，求利動機、企業精神，在傳統的華人社會自然得不到充分的鼓勵了。

華人傳統愛親族、重人情，並不仰賴經濟所得以獲得精神安定。實行科舉取士以來的一千三百多年，絕大部份社會精英的心力所瘁、榮譽地位所寄，又在於讀文章，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」地，狹窄到「學而優則仕」的一途；只以男耕女織爲務，自養納稅爲足的自然經濟，也不能使近代資本主義在華人社會之中發展——直到資本主義的殖民帝國，利炮堅船之後，繼之以商品傾銷，震撼了一向自給自足（有時也嚴重不足）的天朝，危及了廣大華人的生計（註12）。

農村破敗，沿海的華人冒著法律與波濤之險，四出謀生，於是形成一個又

一個脫離了「士農」而仗賴著「工商」的華僑社會。近幾十年的政治動盪，流亡和成長於香港、台灣、海外各地的華人，前所未有地在中西混合文化之下，創造了富裕的工商業社會，大大的動搖了社會學權威韋伯（Max Weber）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這本經典式名著中「儒家倫理阻礙華人社會資本主義發展」的重要論斷，並且漸漸以經濟力量，左右政治（註13）。

至於最大的華人地區——中國大陸方面，由於人所共見的內外形勢轉變的催迫之下，從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是無可避免的選擇，而個體戶、鄉鎮企業等「在野經濟」漸漸兼併、取代漏卮永存的國營公有經濟——一個與五十年代前期程序相反的變化——也在迅速進行之中。這是另一場神州巨變，不流血的、澈底動搖既有價值觀念的、影響深遠的巨變。

近年歐美經濟衰退，東、南太平洋都長期不景，唯有亞太地區欣欣向榮，貿易增長，作爲商戰主將的區內各國華裔企業家人才輩出，而又漸多合作，形成一個龐大而潛力雄厚的「華人經濟圈」，於是，華人社會的舊傳統與新風尚，教育觀念與社工方針，就倍受世人注意了。

結語

數千年來的華人社會，自我滿足於東亞大陸的農耕型文化；近代以來，立足大陸而面向世界，以至散處四海而情繫神州的華人社會，卻先先後後吸收了一些海洋工商業文化，於是華人在倫理、宗教、政治、經濟、科學、藝術以至社會事工等方面的教育，也有劃時代的變化。

在悠久綿延的歷史之中，華人社會表現了剛健的生命力和廣大的涵攝力。現代，它正面向世界，被西方重知識，尚人權、務法制、講民主、崇宗教、慕財富、喜爭競、易分裂、尊人情等種種傳統潮流不斷沖擊，而呈現多元化的新貌，相關的教育理念和社會工作方針，自然也有所調整與開創。那些是華人社會的優良傳統？那些是西方世界的他山之石？怎樣捨短取長？怎樣承繼革新？種種問題正有待於我們繼續研究，繼續擬想。

附註

1. 華北耕地本質與中國文化重視「和諧」，參看 C. P. Fitzgerald（費子智）China: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(F. A. Praeger Inc., New York, 1954 俞仁

寰譯：《中國文化簡史》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，台北，一九六一）第二章，中譯本頁二六一—二七。

2. 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；「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」二語出《周易》「乾」「坤」兩卦《象傳》。時賢張岱年《中國文化的歷史傳統及其更新》以此概括中國民族文化精神，見所著《文化與哲學》頁六六—六七。

3. 參看余英時：《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》（時報出版公司，台北，一九八四）頁二—五。

又：龐朴：《中國文化傳統的繼承與發揚問題》，見《中國文化書院講演錄第一集：論中國傳統文化》（三聯，北京，一九八八）頁八一—八三。

4. 如荀子評論名家之學，是「不法先王、不是禮義，而好治怪說，玩琦辭。甚察而不惠，辯而無用，多事而寡功，不可以為治綱紀」（見《非十二子》篇）名家不久衰微。唐玄奘傳入天竺因明之學，亦不得發展。

5. 參看蔣夢麟：《西潮》，頁二六〇—二六六，有很生動的比較描述。

6. 梁漱溟「互以對方為重」一語，最能道出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倫理精神，見所著《中國文化要義》一文（同3書，頁一三七）

7. 參看文崇一：《從價值取向談中國國民性》，見李亦園、楊國樞編：

《中國人的性格》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，台北，一九七二）頁六四—六六。

8. 參看許烺光著，徐隆德譯《中國人與美國人》（巨流，台北，一九八八）頁四五，一二二，一五九，一六〇，二九九，四〇五，四五二—四五五。（原Francis L. K. Hsu: *Americans and Chinese. Passage to Differences*, 1981 edition,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）

又金耀基：《中國社會與文化》（牛津，香港，一九九二）頁 vii, viii, ix, 2, 66.

又林語堂：《吾國與吾民》（新聲，香港，未標譯者與出版年月）頁一四一、一五四。

又楊懋春：《中國的家族主義與國民性格》（同7書，頁一三七—一四三）

9. 參看許烺光：《中國人與美國人》（同8書）頁二五—二七，五六七—五八三

又：倪約瑟 (Joseph Needham 今作李約瑟) 著張儀尊譯：《中西科學及農業的比較》，見《我時中國的科學》（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，台北，一九五二）下冊，頁二七九。

10. 參看林語堂：《吾國與吾民》，（同8書）頁九三—九四，一七一

又：徐靜：《從兒童故事看中國人的親子關係》及曾焯焯：《從人格發展看中國人性格》（皆見同7書，頁二〇七，二三五—二三六）

11. 台灣李國鼎氏語，據金耀基：《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》（同8書）頁16註60，關於在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方面，建立一項新的「倫」的想法，首先由李國鼎在一篇題為《八十年代社會學者面對的挑戰》的演講中提出，此文提交一九八一年三月台北中國社會學學會年會，參見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六日《聯合報》其後在台灣有廣泛的報導與討論。

12. 參看許烺光：《中國人及美國人》（同8），頁三八七—三九〇。

又：馮友蘭：《中國現代哲學史》（中華，香港，一九九二）頁二。

13. 參看：戴國輝著，魏廷朝譯：《台灣總體相》（遠流，台北，一九八九）

又：殷允芃等《發現台灣》（《天下雜誌》，台北一九九二）

又：文崇一：《台灣社會的變遷與秩序》（東大，台北，一九八八）

又：金耀基：《中國人的三個政治》（《遠見雜誌》台北，一九八八）

又：金耀基：《中國社會與文化》（同8書）

又：李明堃：《變遷中的香港政治和社會》（商務，香港，一九八七）

（本文作者現任香港大學教授）